

## 中美商务外交的经济性制约研究

张丽娟 (美) 吴 鹰

**内容提要** 伴随中美贸易总量与不平衡的同步扩大, 双边贸易的依存度也有改变。美国对中国出口市场依存的提升表明, 寻求扩大在中国的经济利益是美国商务外交的目标之一, 但中国对美国市场的依存度远远高于美国对中国市场的依存度, 因此, 增加了美国在贸易谈判中的筹码。对相互投资的实证分析表明, 中国对美国的国债投资利于美国维持超低利率水平, 反过来刺激了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 从而进一步维系了中美间贸易与资本之间的高度互动。对中美和美日商务外交的经济性制约的比较分析表明, 尽管中国市场相对于日本更开放, 但由于中美战略互信的缺失, 使得中国时常成为美国贸易政治的主要目标国。

**关键词** 中国政治与外交 中美关系 贸易与投资 商务外交 经济性制约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将“商务外交宽泛定义为美国为了实现其全球利益, 与世界其他国家或实体进行的扩大或减少商务合作的任何行动”。<sup>①</sup> 美国商务部最早使用“商务外交”(commercial diplomacy)这一术语, 意在将贸易目标置于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而不是边缘, 它意味着美国政府在全球

\* 张丽娟: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邮编: 250100); (美) 吴鹰: 美国索尔兹伯里大学(Salisbury University)商学院教授。

\*\* 本文为 2012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对美国商务外交策略研究”(项目批准号: 12AGJ003) 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特别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对文章初稿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

<sup>①</sup> Raymond J. Albright, et al., *U. S. Commercial Diplomacy*, New York: 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8, p. 61.

实现其国家利益目标时除了一贯使用的政治、外交和军事杠杆以外,还有一种正在变得日益重要的杠杆,那就是商务杠杆。<sup>①</sup>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研究认为,商务外交的必要性在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由于种种原因,总是与美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商务联系。因此,不论针对哪一类国家,美国的商务外交策略均具有多重目标:首先是经济和商务目标,即实现贸易和投资在全球的扩张,从而保障国内就业增长和经济稳定;其次是政治和民主价值目标,主要通过谈判和签署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突出贸易政治在国际关系调整中的作用。正如佐利克所言,“以自由贸易的攻势激发新的政治活力”。<sup>②</sup>最后,商务外交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安全目标,即将贸易政策与安全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服务于维护美国国土安全和反恐的需要。

简而言之,商务外交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以外交为目的,将扩大贸易与投资作为推进外交的有效途径;二是通过商务目标的实现影响和推进其他非商务目标的实现,将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双赢效果延伸到政治外交领域,乃至军事合作领域。作为外交与商务的交融,商务外交旨在对能够影响甚至主导全球贸易和投资的对外政策施加影响。然而,这种影响存在显著的经济性制约。这里将“经济性制约”简要定义为,两国间主要经济因素的互动、制衡和影响,具体体现在一系列反映双边经济关系的指标上,诸如贸易依存度、相互投资依存,以及多年来形成的两国间在金融、投资和贸易平衡等方面存在的互动均衡模式。

引入“经济性制约”这一概念,目的是通过分析反映中美双边贸易和投资关系密切程度的主要经济变量,进而解读它们对中美商务外交关系的影响与制约。近年来,中美双边经贸关系对两国外交关系的制衡已经超越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这是研究中美商务外交经济性制约的意义所在。文章尝试以经济学的视角,对制约和影响中美商务外交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的主要经济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在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变量时,主要依据是国际收支平衡表中那些最能够代表中美双边商务往来规模的变量,这些变量指标大致有两类:双边贸易依存度和两国间的相互投资依存。在对贸易与投资的实证分析上,本文具体选择了四个变量: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中国持有的美国资产、中国对美国的净出口和美元兑换人民币汇率。需要说明的是,选择人民币汇率这一变量主要是考虑了贸易和投资必须使用的相对货币价格(即汇率),这也正是中美经贸关系中一个最敏感的经济要素。文章通过综合考察上述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动态调整过程,尝试反映中美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与影响程度,也即经济性制约。

<sup>①</sup> Raymond J. Albright, et al., *U. S. Commercial Diplomacy*, New York: 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8, p. 48.

<sup>②</sup> Robert Zoellick, “Unleashing the Trade Winds: A Building-Block Approach,” *The Economist*, Dec. 7, 2002.

## 一、中美双边贸易总量与不平衡双增长

从 1979 年中美建交至今,中美外交的经济性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发展阶段。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和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美关系中的经济性特征更为突出,双边贸易总量的持续增长是中美关系经济性不断增强的最直接体现。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的数据显示,2012 年的中美双边贸易额总量是 1985 年的 69.5 倍,是 1995 年的 9.4 倍,是 2001 年的 4.4 倍。<sup>①</sup>中美双边贸易除 2009 年受金融危机影响略有回落外,其他年份均呈现连续增长,中美间的商务往来程度逐渐加深。从 2001 年到 2012 年,美国对华出口增长高达 477%,中国成为美国出口增长最快的海外市场(见表 1)。

表 1 美国出口额的地区分布 (单位:百万美元)

	2001 年出口额	2012 年出口额	增长幅度(%)
世界	729100	1563600	114
日本	57451	70046	22
英国	40714	54817	35
中国	19182	110590	477
德国	29995	48785	63

资料来源: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Foreign Trade Division, available at: www.census.gov.

在中美双边贸易总量快速增长的同时,美中贸易逆差呈现扩大趋势。从总体上看,近 20 年来中美商务关系的主要特点是“双增长”,即双边贸易总额的稳步增长(见图 1)和双边贸易不平衡的持续增长。从美国对华进出口贸易结构上看,美国从中国的进口贸易总额远远大于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贸易总额,因此,美国对华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状态。虽然中美学术界对逆差的具体统计数据存在争议,但对于因统计方法缺陷导致逆差被夸大的事实中美也存在广泛共识。根据 2013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合作研究估计,以 2009 年为例,如果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按照出口前的经济附加值(value-added)口径统计,那么,美国当年对华贸易逆差总额会减少 25%。<sup>②</sup>

持续增长的对华贸易逆差使得美国某些政治家将“中国制造”与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联系起来,却忽略了中美全面经济依存对双方的积极影响,特别是中国是

<sup>①</sup> 数据来源: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Foreign Trade Division, www.census.gov/foreign-trade/balance/c5700.html.

<sup>②</sup> OECD/WTO Trade in value-added (TIVA) Database: China, http://www.oecd.org/sti/ind/TiVA%20China.pdf, 2013-09-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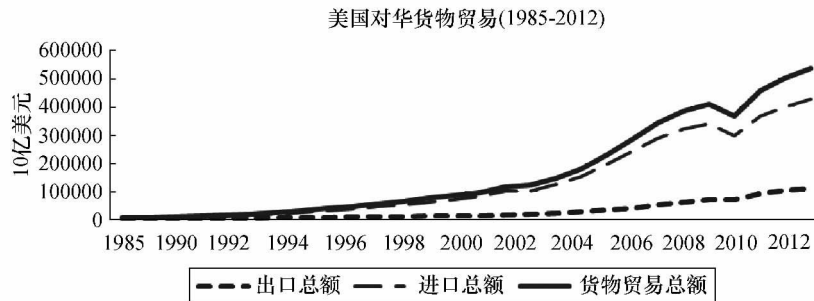


图1 美国对华贸易走势(1985—2012)

资料来源: 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Foreign Trade Division, available at: www.census.gov。

美国出口的最大潜在市场这一事实。2009年9月,奥巴马政府以保护国内就业为名,针对中国制造的汽车轮胎启动特别保障措施,开征为期三年的特别关税。但美国皮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2012年4月的研究表明,该项贸易保护措施实际上是以美国付出更高代价而告终。该研究分析认为,即使最乐观地估算关税保护效应,此项特别保障措施最多也仅保护了美国轮胎业1200个就业岗位,与此同时,由于此项贸易保护措施的实施,美国消费者却不得不以更高的价格购买同样的轮胎,从而抑制了消费并间接导致了零售业就业机会的减少。如果把轮胎制造业受到保护的就业机会和零售业丧失的就业机会相比较,那么,此项轮胎贸易保护主义的成本实际上是美国净损失了2531个就业机会。<sup>①</sup>

有关将美国经济增长乏力简单归因于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特别是中美贸易逆差的评论,同样缺乏依据。正如鲍尔森所言,这些批评家们也许对这样的事实感兴趣,那就是上一次(1991年)当我们(美国)的贸易为顺差时,我们(美国)的经济却处于衰退。<sup>②</sup>事实上,还没有证据表明不断扩大的经常项目逆差与美国缓慢的经济增长直接相关。恰恰相反,自1980年以来,在经常项目逆差增长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0—0.5%的年份,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3%,而当经常项目逆差增长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0.5%的年份,其实际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则高达4.1%。<sup>③</sup>

过去30多年的中美贸易表明:自中美建交以来,两国之间的商务往来不断扩

① Gary Clyde Hufbauer and Sean Lowry, "US Tire Tariffs: Saving Few Jobs at High Cost," *Policy Brief*, Number PB12-9, April 2012,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www.iie.com/publications/pb/pb12-9.pdf.

② Henry Paulson, "U. S.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Speech before the Economic Club of Washington, March 1, 2007," www.treasury.gov/press-center/press-releases/Pages/hp285.aspx, 2013-09-16.

③ Daniel Griswold, "Are Trade Deficits a Drag on U. S. Economic Growth?" *Free Trade Bulletin*, No. 27, March 12, 2007.

大,双边商务利益关系日益密切,双边贸易的持续快速增长正是对这种日益加深的商务关系的最好反映。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存续和双边贸易摩擦频繁,也与双边经贸关系的紧密程度呈正相关。中美贸易摩擦增强不仅不能说明中美商务外交疏远,恰恰相反,这正是由于双边商务外交加深所致。事实上,在世界贸易组织中,加拿大、欧盟、墨西哥、韩国和日本等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也是其主要的贸易争端诉讼对象国。由于中美在全球国际分工中具有极强的互补性,双边贸易存在比较优势下的互补共赢,而且这种互补共赢伴随产业结构的调整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期。中美关系的经济性互动趋强是中美商务外交的主流。

## 二、中美贸易依存度的分析

中美之间的贸易依存度是考察两国外交关系时不能忽视的变量。尽管中美贸易摩擦不断,但双方对对方市场的依存度都在逐步提高。为了考察美国对中国市场和对中国对美国的依存度,这里引入“出口依存度”这一经济变量:

A 国对 B 国出口依存度 = A 国对 B 国的出口贸易总量 ÷ A 国年度出口贸易总量

为了分析美国对中国市场的出口依存度,以下选取了 1992—2012 年美国出口贸易统计数据,将美国对华出口依存度与对日本出口依存度进行比较,以更好地验证中美贸易的依存度走向及其影响。图 2 是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统计数据计算得出的两个序列数据及趋势线:(1) 美国对中国出口依存度;(2) 美国对日本出口依存度。

由图 2 可知,进入 21 世纪后,美国对日本的出口依存度与对中国的出口依存度之间的差距迅速缩小,2007 年两个依存度出现交叉,表明当年美国对中国和日本的出口依存度大体相当,对中美商务外交关系而言,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点。从 1992 年以来的 20 年里,美国对华出口依存度呈现稳步提高的态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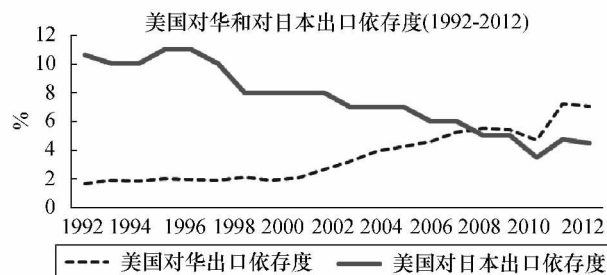


图 2 美国对华和对日出口依存度比较(1992—2012)

资料来源: 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Foreign Trade Division, available at: www. census.

gov.

2012年美国对华出口市场依存度为7.1%，对日本出口依存度为4.5%。

美国对华出口依存度的上升表明，中国市场对美国出口商的吸引力不断提升，共同的商务利益是引领两国积极务实商务外交的基石。而2012年以来美国财政部有关中国是否操纵货币汇率方面较为审慎的表态也表明，美国开始正面认识中美贸易与投资对美国的经济和战略意义，多数美国产业也青睐对华贸易。皮尤(Pew)2012年9月的一项民调表明，84%的专家<sup>①</sup>认为，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贸易关系对美国对外政策非常重要，而在来自政府部门的被调查者中，只有33%的人认为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但同时也有49%的专家认为，在对中国的经济和贸易问题上，美国应该强硬。<sup>②</sup>可见，中美两国既有战略互疑，也有经济和贸易上的互存。总体上，美国对发展良好的中美关系正在走向乐观，但忧虑仍存。尽管中美在政治体制和价值观等方面仍存在分歧，但由于双方经济和商务利益关系的关联性逐步增强，美国在对华外交政策方面不得不顾及其在中国广泛的经济利益，中美商务外交的经济性制约因此得以加强。

当然，中国对外贸易对美国的出口依存度偏高也是事实。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出的中国出口贸易对美国市场的依存度显示，中国对美国出口贸易的依存度不仅绝对值高于美国对华出口的依存度，而且增长速度也明显快于后者。从1985到1991年，中国对美出口贸易占中国出口贸易总额的比例不到10%，1992年这一比例超过10%，并在1993年迅速提高到18.49%。在1998年超过20%之后连续10年维持在20%左右的高度依存。2008年以来，中国出口贸易对美国市场的依存度依然高达17%—18%。(参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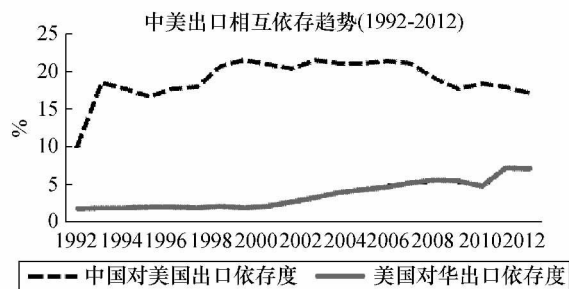


图3 中美出口相互依存度(1992—2012)

资料来源:美国对华出口依存度计算数据来自 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available at: [www.census.gov](http://www.census.gov); 中国对美出口依存度根据中国各年度统计年鉴计算得出。

<sup>①</sup> 此项皮尤问卷面向的“专家”群体305名,包括政府(54)、军界退役(52)、商贸界(74)、学者(93)和新闻媒体(32)等五个方面的专家。

<sup>②</sup> Pew Research Center, US Public, Experts Differ on China Policies, September 18, 2012. <http://www.pewglobal.org/2012/09/18/chapter-3-u-s-policy-toward-china/>.

从趋势上看,中国对美国出口市场的依存度居高不下,而美国对华出口的依存度则是缓慢提升。中国对美国市场持续偏高的依存度可能产生如下政治经济效应:就政治而言,中国对美国市场过高的依存度增加了美国政治家和利益集团提升贸易保护水平的砝码,容易刺激新型贸易保护主义的滋生,使制度性贸易保护更加隐蔽;就经济而言,美国经济波动和人民币汇率变动等因素对中国对美出口存在显著制约,贸易风险加大。

值得注意的是,中美双边经济互动日益加强,一方对另一方经济的整体意义仍在提升。对中国而言,由于中国对美国贸易的结构调整短期内难以实现,中国经济对中美贸易高度依存的局面仍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并将主要呈现以下特征:(1)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对美国市场的出口依存度仍将偏高;(2)中国对美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仍将维持在较高水平,并将远远超过美国对华出口的依存度;(3)美国经济的波动对中国产品出口美国有直接影响。

从长期看,对美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仍然较大,若中国拉动内需政策效果显现,这一影响的程度会有所降低。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对美国贸易和投资乃至整体经济的影响也在逐步增强。这是中美共同商务利益存在的基础。

### 三、中美相互投资的分析

中美相互投资主要包括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和中国对美国投资。为了便于检验中美相互投资的制约程度,以下分析还引进了另外两个经济变量:中国对美国的净出口、美元兑换人民币汇率。

#### (一)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 1. 对华直接投资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不高

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投向是发达国家和地区,欧洲是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投向区域。在亚洲和大洋洲,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流向的国家和地区依次为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台湾。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占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近年来只有0.8%—1.6%,且在美国对亚太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也相对较低,基本不足10%。这与中国经济总量在全球经济和亚太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显然是不对称的(见表2)。

表2 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与对华直接投资比重(2000—2010)

(单位:百万美元)

年份	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	对华直接投资占美国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	美国对亚太直接投资总额	对华直接投资占美国对亚太投资总额的比重(%)
2000	1316247	11140	0.8	207125	5.3
2004	2160844	17616	0.8	374754	4.7
2005	2241656	19016	0.8	375689	5.0
2006	2477268	26459	1.0	403637	6.5
2007	2993980	29710	1.0	444101	6.6
2008	3232493	53927	1.6	484796	11.1
2009	3547038	49799	1.4	518516	9.6
2010	3908231	60452	1.5	611143	9.9

资料来源:US Census Bureau, Table 1296-US Direct Investment Position Abroad on a Historical-Cost Basis by Selected Country.

### 2.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在中国吸收外资总额中的比重较低

与上述情况相对应,美国对华投资占中国吸收外资总额的比重也不大。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美国在中国全部利用外资总额中的比重2001年为10.4%,2005年为5.1%,2008年为3.2%。在2013年10月商务部公布的2013年1—7月份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中,美国仅占3%。但就经营情况看,美国海外投资的收益率高,且多数处于赢利状态。

### 3. 美国对华投资领域主要在制造业且主要销售市场在中国

由于中国金融业开放度不高,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主要是通过独资或合资建设生产基地或研发基地等方式。根据美国制造商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简称NAM)的数据,美国制造商对华直接投资仅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4%,自1999年以来每年大约19亿美元,投资规模仅相当于投资比利时这样一个小国,而同期美国投资加拿大和英格兰的总额是投资中国的3倍之多。

美国制造商协会同时承认,美国制造业投资中国的主要目的不是简单寻求低廉劳动力,而是寻求效率高和高技能同时又相对廉价的工人。在这方面,中国劳动力具有显著比较优势。美国加州大学的研究报告表明,一个中国工人一小时所完成的工作,一个美国工人只能完成其中的18%。也就是说,雇佣一个美国工人的成本与雇佣五个中国人的成本相当。<sup>①</sup>此外,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很多且比例也很高,在人力资源和技术工作岗位方面具有明显的人才优势。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并不会减少美国本土的就业机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The US-China Business Council)在2013年1月发布的名为《中国与

<sup>①</sup> Peter Navarro, "The Economics of the 'China Price'," *China Perspectives*, No. 68, November-December, 2006. <http://chinaperspectives.revues.org/3063>.



《美国经济: 推进共赢的贸易政策》的报告中指出, 对于美国商界而言, 中国是一个 2500 亿美元甚至更大规模的市场。94% 的企业认为它们在中国经营主要面对的是中国市场而不是打造出口平台。2010 年, 在华美国企业生产产品的 74% 在中国本土销售, 销售额达 1250 亿美元, 仅有 8% 出口美国市场。在中国本土销售同样支持了美国的就业, 因为主要零部件和技术研发与设计等仍由其设在美国的公司总部完成。<sup>①</sup> 即使在美国销售的那一部分“中国制造”产品, 每一美元售价中, 也有 55 美分是“美国制造”, 因为“中国制造”从到达美国口岸再到商家销售这一巨大的供应链中, 均为美国本土服务业创造了就业机会。<sup>②</sup> 即便美国商界减少对华投资, 它们也不会将投资直接转移回美国, 而是继续在亚洲寻找具有比较优势的投资目标国。

## (二) 中国对美国投资

近年来, 中国对美国的投资问题备受关注, 一度成为政治和战略上都十分敏感的话题。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大致分为两类: 一类是中国公司通过投资并购等途径进入美国, 另一类是中国政府购买美国国债形成的主权债务基金。从图 4 可以看到, 由于中国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的限制, 以及资本项目特别是对外投资尚未完全开放, 再加上人民币的可兑换性有限, 中国国际投资结构长期以来是以官方储备资产投资为主(约占总投资的 2/3), 对外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其他诸如贸易信贷、贷款及货币和存款等其他投资类别都极为有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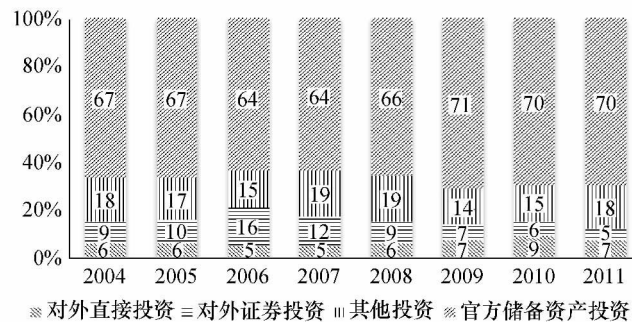


图 4 中国国际投资结构

资料来源: 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官方网站数据计算整理而成。需要说明的是, 图中数字代表该类投资占当年总对外投资的百分比。

① The US-China Business Council. "China and the US Economy: Advancing A Winning Trade Agenda," January 23, 2013, [www.uschina.org/info/trade-agenda/2013/uscbc-trade-agenda-report.pdf](http://www.uschina.org/info/trade-agenda/2013/uscbc-trade-agenda-report.pdf), 2013-02-10.

② Galina Hale and Bart Hobijn, "The US Content of 'Made in China'," *FRBSF Economic Letter*,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an Francisco, Issue 25, Aug. 8, 2011.

2011年,外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总额为2.5478万亿美元,比2010年增长了14%。其中,英国为4422亿美元,是美国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其次是日本,2895亿美元,然后依次是荷兰(2403亿美元)、德国(2159亿美元)、瑞士(2117亿美元)、加拿大(2109亿美元)和卢森堡(1904亿美元)。<sup>①</sup>

中国公司在美国并购的案例近年来呈增长趋势,但成功的案例不多,金额也不大。根据美国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的研究报告,2012年,中国公司在美国投资仅65亿美元,相比上述国家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微不足道。在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1291表”中,<sup>②</sup>由于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规模极小,没有列出关于中国的数据。

即使规模极小,中国对美投资还是引发了美国政治家的高度警惕。作为外商投资审查机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简称CFIUS)在进行投资项目审批时,投资来源国是最为敏感的审查对象。作为经济大国,中国对美国的投资和并购近年来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面临着更多的政治顾虑和更为严格的投资项目审查。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各州政府对来自中国的投资普遍持欢迎态度,因为中国投资带动了地方经济和就业。在中国对美国投资涉及的35个州中,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纽约和伊利诺伊州占了总量的52%。中国对美投资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刺激经济,促进竞争,增加就业,进一步促进了两国经济关系的发展。在金融危机后,中国对美投资可以增加美国就业,使美国企业获取紧缺的研发资金,促进创新,巩固美国的制造业基础。与此同时,两国之间的投资也可以促进双边贸易。<sup>③</sup>

中美之间有关主权财富基金问题的讨论旷日持久。截至2013年9月,中国持有美国国债1.29万亿美元,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者。某些美国政治家担心中国持有美国国债可能会导致种种不良后果。实际上,主权财富基金问题释放的最重要信号是中美之间经济性制约的加强。中美任何一方目前还没有停止交易美国国债的意愿,因为任何单方面的行动都只能产生双输的结果,只有双方继续合作才有可能双赢。

### (三) 关于双边投资贸易相互制衡的实证分析

为了进一步验证中美在投资和贸易领域的相互影响,以下选择了四个变量进

---

<sup>①</sup> Jeffrey Lowe, "Direct Investment Positions for 2009-2011: Detailed Historical-Cost Positions and Related Financial and Income Flows," *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 September 2012, p. 80.

<sup>②</sup> Table 1291.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Pos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on a Historical-Cost Basis by Selected Country, 2000 to 2010, and by Industry, 2010.

<sup>③</sup> David M. Marchick, *Fostering Greater Chinese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February 2012, <http://www.cfr.org/china/fostering-greater-chinese-investment-united-states/p27310>, 2013-1-10.

行实证分析检验: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中国持有的美国资产、中国对美国的净出口和美元兑换人民币汇率。这些经济变量直接反映了中美两国经济往来的主要指标:前三个关于双边经济活动的变量来自于美国经济分析局(BEA)报告的国际收支平衡表,用以刻画中美双边贸易、双边投资等经济交往的规模;最后一个变量则是反映贸易和投资必须使用的相对货币价格,即汇率。对这些直接影响双边经济活动的四个变量进行分析,旨在量化研究中美商务外交的经济性制约。实证分析使用的是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tor Error Corrections Model,简称VECM),其主要目的是考察上述四个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以及在短期失衡条件下的动态调整过程,以便集中反映国际收支平衡表所揭示的中美商务外交的主要经济性制约因素及其动态变化。

首先,关于时间序列变量走向和趋势的分析。自2000年以来,中国对美国净出口持续稳步增长。尽管自2005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开始进入升值通道,但中国对美国的净出口仍持续上升。中国在资本账户尚未完全放开和人民币有限自由兑换的条件下,巨额外贸顺差势必转化为相应的官方美元外汇储备,并进而带动中国对美国投资的持续增加。从2000年到2012年,中国对美国净资本流出平均为每年340亿美元,而美国投入中国的直接投资平均仅为6.3亿美元(未包括美国对中国的其他投资)。中美之间这种“贸易-投资”的双边均衡,曾被称作“中美国”(Chimerica)模式。

其次,通过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分析检验发现,自2000—2012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中国持有的美国资产、中国对美国的净出口和美元兑换人民币汇率这四个变量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长期均衡关系,主要体现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每增加100万美元,会最终对应着中国对美国将近4000万美元的投资;中国对美国净出口每增加100万美元,中国对美国的投资会相应增加290万美元;而人民币对美元每升值一个基点,<sup>①</sup>由于以人民币计量的中国对美国投资(主要是对美国国债的投资)资产额相应缩水,从而使得中国对美国投资额减少大约305万元人民币。这一定量长期均衡关系具有可信的统计显著性水平,它在过去十年间左右着上述四个变量之间的变动,表明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和金融存在显著的相互依存关系,这是中美商务外交发展和演变不能忽略的经济性制约。

诚然,中国对美国净出口顺差与中国对美国投资在资金来源和资金数额上并不直接对应。中国持有的美国资产并非全部由中国对美国净出口(亦即对美贸易顺差)转化而来。中国之所以将大部分来自于国际贸易的盈余投资于美国国债资产,一方面显现了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对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在

<sup>①</sup> 一个基点(basis point)的汇率变动相当于变动0.01个百分点,亦即万分之一的变动。

经济上的利益攸关,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美元作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和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强势地位依然稳固,美国国债自然成为中国国家主权债务基金的首选。再者,中国对美国的投资总额也远远超出了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总额。如前所述,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虽增长迅速,但在总额和份额上均十分有限,这由一系列结构性制约因素所致:中国虽总体经济开放度有目共睹,但金融服务业的市场准入程度不高,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保险等行业的对华投资;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力度不足也是美国高科技企业投资的主要顾虑。此外,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措施也限制了美国企业在华投资,而近年来美国政府对本国企业对华投资和来自中国的投资频频采取加强调查甚至动用特别立法和特殊保障措施的加以制裁的做法,也同时增加了美国企业的经营风险,特别是影响了那些出口导向型美国跨国公司的在华投资。

事实上,双边投资规模上的对等与数额上的平衡,对于中美之间保持长期相互依存的动态均衡关系,既不是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是私人企业追求利润的经济活动,其本身与联邦政府向中国售卖国债筹资没有直接关联;同样,中国在美国国债上的投资也完全不是与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一种等量交换行为。尽管中国对美国国债投资与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在规模上是不对称的,也不必然反映相互间的行为因果关系,但通过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检验所揭示的定量长期均衡关系,则充分证实了最近10年间制约着中美商务外交经济性的量化动态结构。

最后,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Granger Causality Test)对短期因果关系和长期因果关系分别进行了测试。根据对每一个变量所做的轮回测试发现,各变量间长期因果关系十分显著:所有变量都能对非均衡误差做出有效内生反应和调整,体现了均衡调整系统中所包括的变量的确起到了保证长期均衡关系稳定的作用。至于变量间短期因果关系,测试结果凸显了美元兑换人民币汇率与其他变量的不同。除美元兑换人民币汇率以外,其他变量都对影响其自身的所有其他变量的滞后值在1%的显著性水平作出整体内生反应,表明了贸易与投资变量对于模型中除自身之外的所有其他变量(其他变量无论作为个体还是整体)都具有较强的内生性,即其他变量在解释和预测贸易与投资的未来值方面是显著有效的。相反,美元兑换人民币汇率本身是一个弱外生变量,它对贸易与投资变量的滞后值(不管作为个体还是整体)一概不能做出具有统计显著性的反应与调整,这反映了中国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程度,以及市场机制在决定美元兑换人民币汇率上的局限性。此外,测试也表明,美元兑换人民币汇率无法对中美贸易的未来值做出统计上有意义的预测,也就是说,认定美元兑换人民币汇率的高估是构成中美贸易逆差原因的论断缺乏统计依据。

综上所述,对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动态分析证明,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美之

间经济金融互动的特征明显存在。正如“中美国”模式所描述的,中国受益于美国的直接投资,通过将自身的廉价劳动力与美国的资金与技术相结合,从而创造出以外贸出口带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而在资本金融账户尚未完全放开和人民币未能完全自由兑换的条件下,中国巨额出口受益又势必转化为中国对美国的国债投资。这种巨额官方外汇储备的积累有助于美国维持超低的利率水平,并反过来刺激了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从而进一步维系了中美在贸易与资本之间的互动。此外,上述研究也表明,经验证据并不支持美元兑换人民币汇率具有内生性的假设,因此,对于名义汇率在均衡调整中作用的过高估计似乎缺乏依据。

#### 四、中美和美日商务外交经济性制约的比较分析

在分析研究商务外交的经济性制约时,一个不能忽视的前提就是两国是否存在安全利益冲突,是否存在战略互信,因为经济性制约的强弱首先取决于双边安全利益的定位和战略互信的水平。以中美和美日关系为例,即使美国对华贸易的商务利益已经超越了美国对日贸易的商务利益,也不能够简单地推论认为中国在美国商务外交策略中的地位高于日本。事实上也是如此。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美日业已存在的战略同盟是双边商务外交关系的重大前提。因此,尽管2003年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而且美国对日本出口依存度不断下降,但这些并没有对日美商务外交产生负面影响,如导致更多的贸易政治等。相反,尽管事实上中国在全球的崛起是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一个自然结果,并同时带给美国巨大的商务利益,但由于中美之间可能的(或如至少某一方所认为的)潜在安全利益冲突,使得美国国内出现了“中国威胁论”,视中国的快速发展为对美国的威胁。

因此,如果将安全利益和战略互信作为先决条件,美国对华贸易依存度的提高所产生的经济性制约必然有其局限性。由于安全利益位居美国国家利益之首,以安全利益为大前提,美国对日和对华商务利益的比较和考量就退居其次了。美国的国家利益本身隐含着对日本和中国的不同战略“确保盟国的生存和积极合作”以及“在与美国国家利益保持一致的前提下,与可能成为战略对手的国家(中国和俄罗斯)建立富有成效的关系”,<sup>①</sup>这基本反映了美国基于国家利益前提下对日本和对中国的不同商务外交策略。这一点是分析中美商务外交经济性制约时不能忽略的前提。

美日两国确立的战略同盟是当代国际关系中举足轻重的政治机制安排之一,

<sup>①</sup> The Nixon Center, “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s,” *Program Brief*, Vol. 6, No.18, July 12, 2000, <http://www.nixoncenter.org/publications/Program%20Briefs/vol6no18InterestsBrief.htm>, 2012-12-20.

也被两国称为重要的双边关系机制,这是美日两国几十年来外交政策的基石。因此,美日战略互信事实上已经成为双方利益的最重要保证,这预示着美日之间不会因为商务利益的分歧而带来对外交关系的实质性负面影响。相反,这种战略同盟与互信关系成为制约双边商务利益的外交框架。在这一安全利益机制的框架下,日本成为美国在亚洲最紧密的军事、政治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盟友。

鉴于美日战略同盟的存在,虽然双方在贸易问题上长期存在分歧,但由于双边外交深深根植于双边战略同盟的框架之中,因此双边贸易战爆发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并且两国仍能保持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采取一致行动。在奥巴马政府的转向亚洲战略中,日本更是美国主要的轴心国。

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和人民币汇率问题日益突出,这不能不让人想起20世纪80年代美国与日本的商务外交所面临的相似背景。当时日本同样面临着与美国巨大的贸易顺差,以及美国要求日元升值的巨大压力。不过,今天中美关系的背景与当时美日关系的背景存在本质的不同,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美之间不存在像美日之间那样共同的安全利益和战略互信,而“美日战后的安全同盟却降低了美国贸易指责的水平”。<sup>①</sup>因此,美国在亚洲的商务外交策略将日本置于核心地位,将日本纳入美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谈判国,其中商务外交的政治性对经济性的反制约显而易见。

其次,当年的日本市场还远不及今天的中国市场开放。日本的大米市场长期实施严重的贸易保护,美国听之任之。而今天中国的市场更加开放,“中国威胁论”却在美国盛行。这表明,除非中美之间的战略互信达到一定高度,否则,中美经济相互依存对中美商务外交的积极影响仍将受到政治和战略因素的约束,这也充分体现了商务外交中外交与经济的制衡。

再次,当今人民币升值对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影响比20世纪80年代日元升值的国际影响更为广泛且复杂,因为全球化已经将各国经济、贸易与金融等要素密切联系起来,各经济要素间的相互影响、制约与制衡加剧了,但市场更为脆弱。这将会约束美国对人民币汇率单方施压的力度,因为复制“广场协议”模式对美国利弊并存甚至弊大于利。

最后,中国经济对全球贸易的影响与当年日本对全球贸易的影响之程度也完全不同。当今的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具有多元效应,“中国因素”几乎成为每个重大国际政治和经济议题不能回避的考量因素。尽管中美两国在经济和贸易问题上进行了非常广泛的对话和其他形式的互动,双方仍存在程度很高的战略互

---

<sup>①</sup> Gary Clyde Hufbauer, Yee Wong and Ketki Sheth, *US-China Trade Disputes: Rising Tide, Rising Stakes*, Washington DC: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6, p. 76.

疑。<sup>①</sup> 因此,中美双边贸易和投资问题既有双边性,也有多边性;既有政治性,也有经济性。一方面,双边贸易的快速增长显示出双方在商务利益实现上的相互依赖;另一方面,中美贸易中涉及到本国商务利益实现时,又必须兼顾本国国内利益攸关者和外交关系背景下的国际利益攸关者,因此,中美经济和贸易及其政策取向往往具有深刻的国际政治意义。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综合国力的迅速提高,使得美国部分政治家担忧中国的崛起会对美国霸权形成挑战,并有可能进一步威胁到美国全球战略的实施。这种政治性使美国的对华政策始终处于美国外交政策的高度敏感区,在“全面接触”和“战略性伙伴关系”之间徘徊。

美国政府曾尝试放弃动辄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的传统外交模式,将中国定位于美国的“利益攸关者”,期望中国与美国和其他国家一道维持、适应和提升和平的国际体系以确保其成功。<sup>②</sup> 但面对国内产生巨大就业压力的经济困境和政治干扰,美国政治家对中国贸易与投资政策添加了种种限制因素。例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2008年否决华为收购美国网络技术公司3Com,2011年再次否决华为收购美国服务器技术公司3Leaf;奥巴马政府2009年对中国出口美国的轮胎征收特别关税,2012年对中国太阳能产品反倾销和反补贴,随后限制中国私营公司对俄勒冈州风力发电的投资,等等。

由此可见,中美商务外交与日美商务外交在经济性制约的影响程度上存在着很大差别。从总体上看,尽管中美之间存在的巨大商务利益会对双边商务外交的偏离产生良性约束,但这一约束的程度仍受制于双边战略互信是否能够建立及其在未来的稳定程度。

## 结 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研究可以初步得出如下结论:(1)中美双边贸易持续扩大,两国各自商务利益的实现对对方市场开放度和潜在需求的相互依赖逐渐加深。美国在中国经济利益的扩大已成为美国商务外交策略中不可忽视的制衡因素,但寻求贸易平衡仍会继续主导美国对华贸易政策;(2)由于中国对美国市场的依存度明显高于美国对中国市场的依存度,因此增加了美国对华贸易谈判的筹码。随着国际分工进一步深化,两国在产业结构调整 and 转型过程中的问题,都将可能会成为美国政治家对华贸易政治的依据。美国贸易制度和政策将继续为美国国内利益攸关

<sup>①</sup> Wang Jisi and Kenneth Lieberthal, “Addressing US-China Strategic Distrust,”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e, March 30, 2012. [www.brookings.edu/research/papers/2012/03/30-us-china-lieberthal](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papers/2012/03/30-us-china-lieberthal), 2012-05-30.

<sup>②</sup> Robert Zoellick, Statement on Conclusion of the Second US-China Senior Dialogue. December 8, 2005, <http://www.state.gov/r/pa/prs/ps/2005/57822.htm>, 2012-10-10.

者继续提供制度寻租空间,在反倾销等一系列问题上,获得先发优势。因此,美国国内政治对中美贸易的干扰仍将持续下去,甚至可能会以牺牲部分经济利益为代价;(3)中美之间的投资互动依存明显存在。中国在资本账户尚未完全放开和人民币有限自由兑换的条件下,其贸易顺差必然转化为对美国的国债投资,这有助于美国维持超低的利率水平,并反过来刺激了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从而进一步维系了中美间贸易与资本之间的高度互动。

综上所述,中美商务外交关系中的经济性制约日趋增强,这种经济性制约对中美商务外交产生了积极的推动,这是中美外交趋向合作与对话的基石。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巨大的国内需求为美国扩大对华出口,从而带动美国就业增长提供了机遇。与此同时,美国对华出口贸易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美国对其他海外市场的出口,也预示了中国对美国的经济意义,美国在中国经济利益的进一步扩大也将成为美国商务外交策略中不可忽视的制衡因素。

然而,对中美商务外交经济性制约的判定还取决于双边安全利益定位和战略互信水平。一般来说,一个主体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或者经济开放程度)决定和制约着商务外交的经济性和政治性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如发达国家),越会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推动外交目标实现。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国家,则往往处于被动地位。由此可以认为,经济性制约对商务外交起着决定性作用,不过在中美商务外交中,安全利益和战略互信也对经济性制约存在显著约束。因此,中美商务外交关系的稳定发展一方面取决于中美各自对对方的战略定位,另一方面也受制于双边经济贸易和投资的相互依存与影响。正是为了寻求两者的平衡,奥巴马政府特别强调了“经济治略”(Economic Statecraft)的重要性。2011年10月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指出:“经济治略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我们(美国)如何运用全球经济的力量和工具以加强我们(美国)的外交和在海外的存在;二是我们(美国)如何去让外交和海外存在服务于增强国内经济。”美国国务院具体实施经济治略时强调,“国务院的主要行动体现在4个方面:第一,更新我们的对外政策重点,更多地将经济议题纳入其中;第二,制定经济方案应对战略挑战;第三,加紧商务外交的步伐;第四,建设外交能力去执行这一雄心勃勃的议程”。<sup>①</sup>中美商务外交对美国是挑战,对中国更是挑战,如何实现双赢,是一个具有国际政治经济意义的研究课题。

---

<sup>①</sup> Deborah A. McCarthy, Economic Statecraft: Developing Partnerships with the Private Sector. December 10, 2012. <http://www.state.gov/e/eb/rls/rm/2012/201920.htm>.



and contradictions in the two camps. 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l problems of the two alliances is therefore as important as studying the military situation and power balance on the battlefield.

#### A Study of Economic Constraints on U. S. -China Commercial

Diplomacy ..... *Zhang Lijuan and Wu Ying* (83)

The extent of trade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 S. changes with the increasing volume and increasing imbalances of bilateral trade. While growing U. S. export dependence on the Chinese market suggests that seeking market expansion in China is one of the major objectives of the U. S. commercial diplomacy, China's much higher export dependence on the U. S. market provides the U. S. with more bargaining power in trade negotiations. Our empirical studies indicate that China's investment in the U. S. government bonds helps maintain ultra-low interest rates in the U. S., which in turn stimulates U. S.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Lastl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conomic constraints on U. S. - China and U. S. -Japan commercial diplomacy finds that the lack of strategic trust between the U. S. and China explains why China often becomes the target of the U. S. trade politics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Chinese market is more open than the Japanese market.

#### Sino-U. S. Dual Leadership System and Northeast Asian Security:

Structural Imbalance and Order

Reconstruction ..... *Wang Junsheng* (99)

In recent years, Northeast Asian security has encountered numerous intractable problems, and the lack of substantive Sino-U. S. cooperation makes them difficult to resolve. A Sino-U. S. dual leadership system will be ideal for both countries to cooperate on regional security issues. On the one hand, power distribution in Northeast Asia and the relative power balanc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 S. suggest that a relatively balanced dual structure has emerged in the reg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dual leadership system will further the interests of both countries as well as those of the rest of the region. Our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case studies show that China and the U. S. could try to build dual leadership at bilateral, tr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levels.

#### Hirano Kenichiro's International Cultural Theory: Reflections on the Japanese School's Cultural Perspectiv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Yi-hao Su and Chih-yu Shih* (114)

Among 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the cultural perspective advocated by some Japanese scholars is quite promising, as it believes that "culture" instead of "nation-state" is a better starting point to explain East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Kenichiro Hirano stands out as a great example. He is a pioneer in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cultural studies in Japan, and his studies of Manchuria and East Asian community help him reflect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e distinguishes be-